

吳汝綸 著
朱秀梅 校點

吳汝綸文集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吳汝綸 著 朱秀梅 校點

吳汝綸文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吳汝綸文集 / 吳汝綸著；朱秀梅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6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7976-1

I. ①吳… II. ①吳… ②朱… III. ①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清後期 IV. ①I241.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43005 號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吳汝綸文集

(全二冊)

吳汝綸 著

朱秀梅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5.375 插頁 12 字數 432,000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7976-1

1 · 3016 (精裝)定價: 12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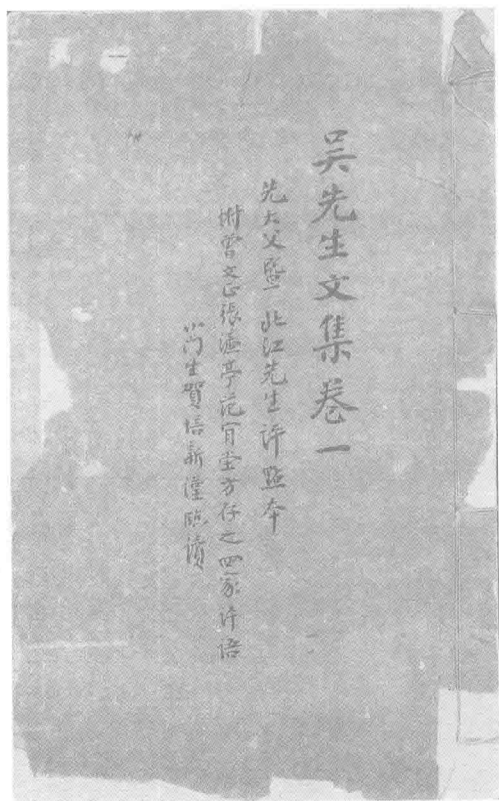


吳汝綸像

桐城吳先生
文集

門人李嘉璧
敬題

吳氏家刻《桐城吳先生文集》



吳闓生評點本《桐城吳先生文集》

桐城吳先生
年譜

甲申孟春
汪時璟題

序 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俾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

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捨、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序

關愛和

吳汝綸是桐城派的最後一位大師。鴉片戰爭爆發之年（一八四〇），吳汝綸出生於安徽桐城的一個耕讀之家。一八六五年，二十六歲的吳汝綸取進士第八名，以內閣中書身份被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藩選入幕府，襄助軍務。一八七一年被薦任直隸深州知州，不久丁父憂。一八七六年，在天津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幕府。一八七九年代理天津知府，一八八一年出任冀州知州。一八八八年辭官，就任保定蓮池書院主講。一九〇二年因吏部尚書兼學部大臣張百熙保薦，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教習，加五品京卿銜，堅辭。張百熙跪求，吳汝綸改請去日本考察學制。歸國後回家省親，一九〇三年二月病逝於桐城。

吳汝綸的家鄉桐城，是一個古文傳統深厚、古文大家迭出的地方。吳汝綸出生時，「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說法已流傳百餘年，鄉邦文化的基因在血脈中流淌。吳汝綸早年得志，出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府之中，親聞南北大臣聲歎，親歷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參與曾、李奏章公文的撰寫修定，處在時代風雲的中心。然而却官場蹉跎，入仕二十年，任職直隸數州，未嘗遷官增秩，最終品服

如初。旋以壯盛之年，急流勇退，主持書院，教授生徒。經甲午戰爭、庚子事變，自稱「無復問世之志」的吳汝綸，爲嚴復《天演論》作序，推闡進化論，張揚新學。在西風東漸汹汹逼來之際，益信天下大計當以作育人才爲先。毅然請求考察日本學制，並多有收穫。但可惜生年不永，壯志未酬。吳汝綸去世後的第二年，即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廢除，學堂教育鵲起，中國現代教育的帷幕隨之拉開。吳汝綸的弟子馬其昶作《吳先生墓誌銘》，有「始爲吏，繼爲師」的話。以「爲吏爲師」概括吳汝綸的一生，是十分熨帖的。晚清甲午之後，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西學東漸由涓涓細流而漸成鋪天蓋地之勢。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思想與文學的重建由此拉開帷幕。在中國思想與文學的重建過程中，古與今的貫通接續，依然普遍存在於士林之中，但中與西的衝突融合，則更深刻地攪動著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和感情世界。在那個特定時代之中，吳汝綸深感「朝廷不改，國必亡；士學不改，種必亡」的政治與文化危機的存在。通過吳汝綸，我們可以洞悉晚清士大夫守先待後的精神與情感。

一

桐城派形成於雍、乾，極盛於嘉、道，綿延於同、光，籠罩文壇二百餘年，至「五四」時期才臻於消亡，是有清一代延續最長久，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創始者方苞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作爲行身祈嚮，即有承接孔孟程朱之道統、韓柳歐蘇之文統之意，他創

立「義法說」，認為文章應「本經術而依事物之理」，講求體要、詳略、規模、法度，提倡清正雅潔的古文風格。方苞之後，其同邑後學劉大櫟、姚鼐，各以自己的寫作經驗與閱讀體會豐富發展了「義法」之說，共同奠定了桐城派古文理論的基礎。方、劉、姚又以言簡有序、清淡雅潔的散文創作名噪一時，贏得「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的贊譽，桐城派之名，遂大行於天下。姚鼐晚年，講學於江南各地，編輯《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於唐宋八大家之後，明僅錄歸有光，清僅錄方苞、劉大櫟，以標榜古文源流及傳緒之所在。此書流傳甚廣，影響頗大。方、劉、姚之後，桐城派衣鉢代有傳人，大體恪守「學繼程、朱，文宗韓、歐」的基本宗旨。桐城派作家對士風、學風、人心、教化等問題始終保持特有的敏感，他們關心社會的發展和人間政治秩序的安排，並表現出積極參與的熱情。桐城派作家崇尚《左》、《史》及唐宋八大家以來的古文傳統，注意不斷地體悟、總結、發現並揭示單行散體之文（旁及詩、賦）的寫作經驗和創作規律，豐富與發展已有的理論體系。桐城派作家總體上保持清正雅潔的創作風格，追求文從字順、言簡有序，純淨秀美，於平易瑣細中見情致的文章風範，在各種散文體裁，尤其是雜記序跋、碑誌傳狀之文中顯示出才華和優長。

洋務運動方興未艾的咸、同年間，姚鼐門下弟子梅曾亮、管同、劉開、方東樹相繼去世，對桐城派發展施以援手的是曾國藩。在桐城派文人中，曾國藩以姚鼐為師、梅曾亮為友。曾氏《聖哲畫像記》中有「國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啓之」之言，在《復吳敏樹》文中，推姚鼐古文為「百餘年主盟」，

而置身於姚鼐私淑弟子之列。晚年在軍營中，他還多次夢中與姚先生談文，由此可見他對桐城古文癡迷之深。曾國藩曾用爲人的標準評價清代學術，在治古文之學時，曾國藩爲己爲人的界線也是十分清楚的。桐城派古文義精詞俊，清通淵雅，理論上示人途徑又多詣極之語，這是曾氏私淑姚鼐、推服梅曾亮的原因。但桐城古文也有空疏、窳弱、取範狹窄、立論偏頗之處。曾國藩在古文創作與理論上，以自己的審美識度、審美經驗爲基本點，改造桐城派古文，增強古文表情達意的功能，擴大古文的應用範圍，使之更適應鴉片戰爭之後社會發展的需求。曾國藩對桐城派古文的改造與發展，被曾門弟子概括爲「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於一途」。

所謂「擴姚氏而大之」，曾國藩以爲姚鼐於古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雄直之氣的形成，與作者的氣質、才力有關，作者須具有宏大剛毅、堅勁有爲之氣質，有列子禦風、噴薄而出之才力，又須有訓詁精確、聲調鏗鏘的選字造句功夫。欲救柔弱之弊而爲雄奇之文，則需熟讀揚、韓文，而參以兩漢古賦，需要打破取範八家、奇句單行的爲文戒律，打破桐城派所苦心營造的樸素淡雅、紆餘悠長的文派風格。

再看「並功、德、言於一途」。隨著鴉片戰爭前後社會時局的變化和士風學風的轉換，桐城派古文自姚門弟子以後，便自覺地強化了社會功能。曾國藩以書生率軍，對古文與事功的關係，有著名的「堅車行遠」論。「堅車行遠」論，在把文事辭章之學視爲士儒側身天地、有所作爲的必備功夫之

外，還把其看作是實現某種政治功利與人生目的的手段，是一種極富現實指導性的理論。事功變幻無常，而文章爲道德之鑰、經濟之輿，不可不早作準備。曾國藩以爲：「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考據、辭章、經濟，對應於孔門德行、文學、言語、政事四科。並功、德、言於一途，其於辭章，則意味著要在闡明性道的同時，增加討論經世方略、探求自強之路的內容；在抒寫情志之外，留意於記敘事功、撫談掌故之作，使得古文之學，真正成爲議論軍國、臧否政治、慷慨論天下事的利器，成爲開啓蒙昧、昌言建策、道問學與新新民的堅車，並爲據亂升平、建功立業者留下文字的記載，讓事功憑藉文字不朽。並功、德、言於一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桐城派文不長於持論，以虛義相演的弊端，但同時也使桐城派樸素雅潔的文人之文，逐漸變爲縱橫捭闔的政治家之文。」

作爲政治家，曾國藩持「堅車行遠」說，希望並功、德、言於一途；作爲古文家，曾國藩又深知文章能否行遠，又別有能事在。性理、經濟摻雜入文，難以成就自然之文、藝術之文。桐城派「學行程、朱，文章韓、歐」的命題中，蘊含著追求文道並至而顧此失彼的緊張。曾國藩論吳敏樹《書西銘講義後》之類的文字，以爲「然此等處，頗難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古文不宜說理，一是指從先秦兩漢脫胎而來的奇句單行的散體之文，經唐宋古文家的改造，偏嚮於文人情趣、情致一路，長於敘寫而短於持論。二是指演繹性理講求周嚴精當，持論篤重，而古文則別求文境、聲音與色彩。與其不善兼取而足以相

害，不如從一而擇，以免失措乖張。曾國藩論劉蓉之作云：「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學理窟》及各語錄劄記，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悅。」曾國藩有關義理、文章不可兼得的感慨，透露出古文作者徘徊於義理、辭章之間顧此失彼的尷尬與痛苦。而曾氏與文友「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的相約，又透露出古文家決心與這種尷尬與痛苦告別的覺悟。這種覺悟來自於對文學史上道與文不能不離爲二的正視，也來自於對擺脫一切有形成規、無形束縛，而自任性情、放馬由繮創作境地的渴望。堂堂正正以古文爲業的想法，相對於「堅車行遠」說而言，又更加古文家化了。

吳汝綸少習舉業，對鄉邦文化，自然是耳濡目染，但真正留心文章之學，還是在進入曾國藩幕府之後。一八五八年曾國藩對古文辭之興趣日趨濃厚。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都是在此之後，因文得知於曾氏，而被延入幕府的，世稱「曾門四弟子」。曾門四弟子以文字得知於曾國藩，都在才華未展露之時，日後各有成就，而無不將在曾氏幕府中的閱歷看得十分重要，十分珍貴。薛福成有《叙曾國藩幕府賓僚》一文，將賓僚分爲四類：黎庶昌、吳汝綸列名「幾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吳敏樹、張裕釗列名於「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並不責以公事者。薛福成《跋曾文正公手書冊子》描述軍次生活道：「文正每治軍書畢，必與群賓劇談良久，雋詞閎義，濤

海森至，間以識略文章相勸勉。或長日多暇，則索書之紙，雜陳几案，人人各贖其意去。」薛福成爲黎庶昌《拙尊園叢稿》作序，回憶初入幕府，曾氏以文事相勉勵時的情景道：

居常誨人，以爲將相者，天下公器，時來則爲之，雖旋乾轉坤之功，邂逅建樹，無異浮雲變幻於太虛，怒濤起滅於滄海，不宜嬰以成心。文者，道德之鑰、經濟之輿也。自古文、周、孔、孟之聖，周、程、張、朱之賢，葛、陸、范、馬之才，鮮不藉文以傳。苟能探厥奧妙，足以自淑淑世，舍此則又何求？當是時，幕府豪彥雲集，並包兼羅。其治古辭者，如武昌張裕釗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吳汝綸摯甫之天資高雋，余與蕓齋咸自愧弗逮遠甚。

吳汝綸對六年的幕僚生活，也多有回憶記述。其《姚公談藝圖記》寫道：

曾文正公在江南時，大亂新定。往往招携賓客，泛舟秦淮，徜徉玄武，莫愁之間，登眺鍾阜、石頭，流連景物，飲酒賦詩，以相娛娛。汝綸於時間廁末座，實嘗躬與其盛。

《題玉露禪院》寫道：

始吾在是葦，公事稀簡，日從文正諸客娛遨。每飯罷，輒連鑣走馬，始出皆垂策緩行，已忽縱轡怒馳，爭先鬪捷，取獨出絕塵爲快。有墜馬者，則皆踣足迴旋，叢集而譁笑之。是時諸客

中吾年最少，意氣之盛，豈復有度量。

曾國藩及門客弟子「並功、德、言於一途」、「擴姚氏而大之」的努力，使他們的價值取向顯示出與桐城派的不同，後人將曾國藩和曾門弟子稱之為湘鄉派。湘鄉派遵循以文見道、堅車行遠的理論，在文章題材方面明顯增加了講求經世要務，記述當代掌故，鋪敘文治武功的內容。在藝術表現方面，湘鄉派重義而不輕詆於法，求雅而不拘泥於潔，其行文風格意欲繼承方、姚之熨帖而去其柔弱。湘鄉派與桐城派有所不同，又有著割捨不開的聯繫。曾門四弟子中，薛福成、黎庶昌致力於事功，且將文字功夫看作行遠之堅車，刻意揣摩鍛煉，屬意於「並功、德、言於一途」。張裕釗孜孜於文事，以著述授徒窮其一生，尋覓以柔筆運剛氣的雅健之道，以補救桐城派的柔弱不振，屬意於「擴姚氏而大之」。四弟子中，後死而對桐城派的發展影響最大的是吳汝綸。

曾門四弟子中，唯吳汝綸是桐城人。其對鄉邦古文傳統，充滿著敬意與自豪之感。在《祭方存之文》中云：「吾縣文學，聳德聖清。淵源所漸，自方侍郎。韓歐之文，洛閩之蘊。並為一條，壇宇維峻。」以桐城文學為清代之冠而引為驕傲。一八八八年，面對「陵夷至於道光之季，稍衰微矣」的桐城之學，吳汝綸作《孔叙仲文集序》以為：「去偽存真，傳承古文傳統，「幸生桐城，自少讀姚氏書」的鄉里後生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對湘鄉派「擴姚氏而大之」的寫作取向，吳汝綸雖贊成，但也有